

信仰是光，照亮前程

——观话剧《钱瑛》有感

□魏林



大型廉政话剧《钱瑛》剧照。

著名剧作家赵瑞泰编剧，王佳纳导演，湖北省演艺集团出品，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廉政话剧《钱瑛》一经上演，便产生热烈反响。贪污腐败老百姓痛恨，惩治贪污腐败老百姓痛快。党员干部看了深受洗礼，普通群众看了痛快淋漓。

话剧《钱瑛》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故事，讲述了钱瑛从一封来信顺藤摸瓜，调查官僚主义腐败大案，最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1957年春节前，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钱瑛收到一封来信，是革命战争年代老战友刘平实寄来的。钱瑛带着喜妹来到刘平实工作生活的羊角村看望老战友了解情况。当地“饿肚子”“逃荒”的现实遭遇让钱瑛痛心疾首，她决心一查到底。昔日战友丁小江已是省委副书记，他为了所谓“政绩”，维护“大好形势”，一面对当地“饿肚子”的情况隐瞒不报，打压群众；一面指使克扣中央下拨的救济粮，导致饥荒加重，农民大量逃荒，给党的事业和形象带来严重损害。钱瑛查清事实后，不徇私情、秉公办案，坚决严肃处理丁小江的违法违纪行为，挽救了人民生命，为党和国家挽回了损失。

钱瑛同志被誉为“女包公”，在革命年代她初心如磐，信念坚定，经过革命烈火锤炼，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仍然把党的宗旨牢记在心，把人民挂在心上，始终不忘使命，高擎信仰火炬，风雨无阻，一路前行。她的老战友丁小江不一样，曾经他也是出生入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跟着党从上海总工会到洪湖赤卫队，到后面的解放战争，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丁小江变了。当钱瑛当面斥责丁小江，“现在你看不见人民疾苦，你听不到人民的呼声，你的心里没有人民啊！你根本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丁小江歇斯底里的血就不算了吗？难道你想让我这样的革命功臣寒心吗？你就不怕得罪他们吗？”丁小

江的蜕变令人惋惜，令人深思。为什么一位连死都不怕的革命英雄在和平建设年代却堕落了？一个人信仰动摇了，精神就会“缺钙”，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钱瑛还是从前的钱瑛，丁小江已不是从前的丁小江了。

一个人的成长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有的人在考验中成长，有的人在考验中投降。人在面对考验尤其是生死考验时，最重要的精神砥柱还是信仰，信仰的旗帜倒了，人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经不住风浪，在微风细雨中也许还能挺住，当狂风暴雨来临时恐怕就难以招架了，到最后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投降。

钱瑛身上的信仰之光，照亮了她的形象，也让丧失理想信念的人黯然失色。在剧中之所以能清晰感受到信仰之光，不仅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语言表达、行动选择，还与本剧的艺术手法息息相关。剧中“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是本剧非常显著的特点之一。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深对比，这种手法看似寻常，但因突出对比的戏剧性效果，使得本剧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自然而然融为一体。戏剧性对比的运用，使人物身上信仰的味道更浓烈，信仰的力量更强大，信仰的光芒更耀眼。

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时空对比，人物置身于不同的时空环境，相互交错激荡。他们的行动、选择，昭示着鲜明的性格特点，如钱瑛、丁小江等人物性格、情感在对比中变得更加清晰，形象更加饱满。钱瑛恰似一朵光芒四射的信仰之花热烈绽放舞台。时空对比还只是结构上的前后对照，要引起观众情感共鸣，还需更深入人心的对比，剧中巧妙地呈现了令人五味杂陈的情境对比：第二幕，刘平实和羊角村村民过年吃用野菜、糠、观音土拌成的“观音饼”，嚼不动，咽不下；第五幕，在庆功宴上领导们吃的红烧肉、大盘鸡、鱼，钱瑛将“观音饼”带到庆功宴上，强迫干部们当场

吃下，两种戏剧性效果的情境对比。人物的思想、情感、动作在特殊情境中的比较，往往不言而喻，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能让人感受到深刻的意蕴，带来心灵的震颤。钱瑛和丁小江曾经是战友、是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此时此刻丁小江被群众举报，有重大失职，钱瑛要调查丁小江，两人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人物情感发生激烈碰撞，钱瑛表现的“突然爆发”“严厉”“正气凛然”，而丁小江则是“怒吼”“发了疯似的”“强词夺理”，直到第六幕，在层层铺垫的对比中，将矛盾推向爆发的顶点，精彩的表演扣人心弦，情感的宣泄酣畅淋漓，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审美体验。不仅如此，剧中还突出了是与非、公与私、崇高与丑陋等对比关系，经过步步推进，层层深入，人物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信仰，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人物形象有了强大的内核：有信仰的人，可以经风雨雨毫不动摇，没有信仰或信仰不牢的人，就会抵挡不住诱惑，被自己的欲望吞噬还浑然不觉。剧中钱瑛、丁小江这两个形象，对比最为鲜明，反差也极为强烈。刘平实、杨虎兆身上也都可以看见信仰在他们心里的分量或变化。

在故事情节进展中，处处相互比照，从现实出发又回溯历史现场，还原人物在革命岁月中的光辉场面，两者交织在一起，在丰富情节基础上保持集中，在集中基础上丰富情节，全剧波澜起伏，情感荡气回肠。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特点，不仅让故事容量更丰富，人物形象也更饱满，完整戏紧紧抓住观众心理预期，引导观众跟随故事情节抵达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了主要人物身上的光辉品质——信仰之光。

话剧《钱瑛》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与革命历史相关，传承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观照现实生活，关乎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因为人需要有信仰地活着。（作者系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编剧）

为儿童建构起一个完整而坚固的精神世界

——评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

□蔡家园

在儿童文学愈来愈市场化的今天，长篇小说小说愈加追求故事的神奇性、曲折性和娱乐性，以迎合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线性的传奇叙事成为流行模式。毋庸讳言，单一化的叙事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创新发展和美学品质。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独辟蹊径，以意象组合和解读意象的方式展开叙事，仿佛清风拂面、月出团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江南小镇上有一所福利院，父亲和母亲在这里收养了一群被遗弃的孩子，组成一个温馨的家庭。三和尚闹出一个恶作剧，导致整条老街被大火烧毁。父亲主动承担责任去公安机关自首，临走前叮嘱“家”不能散。福利院变成残垣断壁，母亲和四个孩子无家可归。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重建家园，等候父亲归来。三和尚在火灾中失去亲爸爸，也加入福利院大家庭中……彦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叙事自觉意识的作家，林彦在《九歌》中避开了传奇叙事模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话语表意形式”，并以此实现了对于儿童小说诗性价值的开掘。

《九歌》由引子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引子部分从七月的视角切入，交代《九歌》的来历——姐姐四月将弟弟阿黎写的诗歌誊写、配图并装订成册，仿照屈原的作品命名为《九歌》。这些诗歌引起七月的共鸣，“好多次，某个零碎的句子，像一条啃桑叶的蚕，猛地将她的思绪咬出一个洞，一段青涩的往事倏地从洞里露出来”……正文分为九章，每章开头是一首诗歌，后文则围绕诗歌中的“零碎字”展开叙事，每个故事都可视为对诗歌中关键词的注释。全书共有五十四个小故事，看似散漫其实精心地拼贴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江南小镇的风情画卷以及一代人纯真而略带苦涩的童年生活。

以第二章为例，标题为《避音》，关键词是六个意象，依次为“鹿井”（古老的水井边回响着父亲的足音；水可以灭火，引出火灾）、“时钟”（日晷标记时间，引出父亲的求学经历，他立志要破解数学难题“黎曼猜想”）、“黎曼辞典”（虚构的辞典，指父亲收集的数学资料和演算的如山草稿）、“归巢”（父亲在双塔下喂的鸽子会自己归巢，隐喻自由与归来；他去自首前，给孩子们留下六个愿望）、“春望”（指代遭遇火灾之后生活的艰难，与杜甫的诗歌《春望》形成互文）、“黄丝巾”（出自一个温暖的传说，母亲坚信出走的孩子会归来，父亲也会归来）。在这一章中，作家围绕这六个意象展开叙事，笔法灵动，纵横开

阖，收放自如，重点讲述父亲的故事。父亲是一个“怪人”——痴迷于研究数学难题，“视线总是抬得很高”“像在做梦”；坚持喂养野外的鸽子，仿佛生活在别处；他放弃了去南开大学任教的机会，留在小镇上做一名普通数学老师，和母亲一起照顾这群并非他们亲生的孤儿。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也改变了福利院孩子们的命运——父亲蒙冤入狱，孩子们被抛入生活的沙砾中经受打磨……阿黎和姐妹们慢慢理解了父亲的“怪”——那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担当和孤身犯险，他执着于追求理想，执着于坚守爱，并努力将这些统一在“时间”之中，让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

小说的其他八章的叙事方式与第二章相似，每章都是以诗歌开始，随后选择五至七个印象展开碎片化的故事。每一章聚焦一个人物，好婆、母亲、三和尚、二月、四月、阿黎就这样在江南小镇如梦如幻、如诗如画一般的意境中款款走出，活灵活现地来到我们眼前，演绎一幕幕苦涩而温馨的话剧。

作家通过这种特殊的叙事结构和意象设置，将个人的成长史叙述纳入到了一个具有丰富维度的价值和意义体系之中。父亲、母亲和好婆以大爱、坚韧和善良对抗着苦难，建构起一片丰饶的精神家园，孩子们则在苦难的磨砺中成长，对理想主义，对爱和亲情，对生命的意义不断加深着理解，也更懂得坚守、包容和牺牲。

《九歌》是一部写给儿童阅读的小说，也是一部适合成年人阅读的年代故事。它就像一曲悠长而绚丽、自由而奔放的清歌，读来让人心静久难以平静，不禁联想起屈原的《九歌》。作家自言两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无关联，但是，这部小说绚丽、明亮而自由、灵动的风格，还有那种激发生命涟漪荡漾的略带感伤和惆怅的情绪，还是让人隐约感受到文学经典的美学精神穿越时空在当下的有力回响。

《九歌》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好评，因为它以独特而新颖的表意形式实现了对精神性的深度追求，从而超越同类儿童文学作品。这再一次证明，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绝不能仅仅是迎合儿童的猎奇心理和淘气本能，而是应该通过新颖富有美感的艺术形式塑造生动饱满的艺术形象，帮助儿童建构起一个完整而坚固的精神世界。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社长、主编）

森克的归乡之路

□永城

第一次到武汉是2003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为了此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签下第一份出版合同，说起来，武汉也算是我文学创作的半个故乡。

22年之后又到武汉，是为了把去年出版的我的第十部长篇小说《莫莉和森克》，介绍给“故乡”的读者。22年前那部青涩作品的主人公是远渡重洋的留学生，而22年后这部《莫莉和森克》里的主角“森克”是学成归国的工程师开发的第一个AI程序。这是我第一次让一个非人类的计算机程序担任小说的主角，使用第一人称，从它的视角讲一个紧张有趣的“破案”故事，是个很大胆的主意，当然也很难，算是新的探索。今天的我们已经沉浸在AI的海洋，被许许多多类似“森克”的AI程序所包围，我认为很有必要创作出森克这样一个角色，让它带领读者深入AI的世界里，看看AI在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同时，如何窥伺我们的秘密，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

在故事里，AI系统森克协助人类女调查员莫莉，调查一起神秘的商业间谍案件，从北京到杭州再到意大利都灵，一路危机四伏。通过和这个时而聪明、时而糊涂、时而傲娇、时而卑微的人类小伙伴莫莉打交道，森克的“程序命运”被彻底改变，在故事的结尾，即将被毁灭的森克终于产生了自我意识，体会到人类的情感。不得不产生，这部分内容是有些科幻的，目前的AI程序虽然能像森克那样窥伺我们的生活，却并没有自主意识。但是作为曾经的机器人工程师，我认为一个有意识的森克也许并不遥远。毕竟回望过去，再来看看当下，我们现在拥有的技术和被技术改变的生活，在二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1997年的秋天，24岁的我在斯坦福大学色彩斑斓的校园里亲手制作的第一个“机器人”，是一只会说话的玩具兔子，我用剪刀剪开它的肚皮，把电路板、扬声器、电池和传感器塞进去——请千万别把我当成电锯狂魔，因为我后来又把兔子的肚皮缝好了，缝纫技术相当有限，但起码看上去起死回生，而且充满活力。我摸它的头，它会咯咯地笑，并且充满智慧。我说：好黑啊！请快把灯打开吧！我跟它说：我爱你！它会沉默几秒钟——程序正在假装思考，然后它会给出几种不同的回答：

“我真有那么可爱？”
“你爸是不会同意的！”
“你男朋友知道吗？”
“你昨天不是刚刚说过这句？”
“别逗了！我知道你喜欢谁！”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啊！”

同学们对兔子的回答很感兴趣，纷纷跑来自向它倾吐爱意，兔子不停作答，难免有几回显得特别可爱，甚至不小心揭穿别人的小秘密，这让那只兔子在1997年斯坦福工程院的课堂上颇有人气，让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生们着实娱乐了十几分钟，有人甚至扬言：AI这不是要觉醒了？当然只是戏言，其实兔子的回答只是

随机选择，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AI程序已经能够理解越来越多的人类语言，并且给出合理的回答，比如DeepSeek、ChatGPT，不但能跟你聊天，还能按照你的要求搜索、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用你的一秒完成人工需要几小时、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森克就像一套功能更加强大的“DeepSeek+”，它不仅能从互联网上收集和学习数据，还能从许多的摄像头、麦克风和数亿人的手机里随时收集数据。千万不要认为这是科幻，因为已经有不少程序正在这么做，它们潜伏在互联网上，潜伏在你的手机APP里，掌握着亿万人的言语、行踪和各种生活、消费习惯。只不过，它们还不能像森克那么“善解人意”——准确理解人类语言和表情的含义。但是当个AI程序越来越了解人类，它和一个“真人”到底谁有多远？

《莫莉和森克》创作于2021—2023年，我相信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几年都印象深刻，尤其是2022年，起码对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在被地球上多种多样的限制令折磨了近两年之后，我终于在2022年初恢复旅行，而且是报复性的——从美西到美东再到加勒比，从伦敦到罗马再到佛罗伦萨和都灵，然后是希腊、土耳其和埃及。眺望夕阳下的阿尔卑斯雪山，以及晨雾笼罩的金字塔，不得不出结论：自由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我想我的森克大概也有同感，毕竟它是在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里写出的，我的旅途就是它的成长之旅，自由的行走孕育在组成它的每个文字和标点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故事里的森克越来越想成为一个真人。

其实早在童年时代，我就常常盼望能有一个像森克那样的朋友。由于某种慢性疾病的约束，我的整个小学时代几乎都在家中度过，父母上班后把屋门反锁，我开始寂寞而漫长的一天，最亲密的伙伴是地图册和列车时刻表，我反复研读，想象着自己乘坐书上的线路，按照铅印的地名周游世界。我的另一个“密友”是半导体收音机，我总是随时带着它，上厕所也不例外，让它一直跟我说话，给我讲故事，美中不足的是，它只听着自己的话，从来不听我说。所以创作森克，也算是延续和扩展我的一个童年的梦想。

我希望森克也能帮你延续某个童年的梦想。

森克回到武汉，是当年那个追逐文学梦想的小作者的归乡之路，也是科技迅猛发展的见证之路。AI本来就是人类的梦想，如今梦想越来越趋近现实，现实中的人们最好做些准备。对于好龙的叶公来说，龙也是梦想，但是龙真的来了，叶公却惊慌失措。自己的梦想为现实，每个曾经做梦的人，都得为自己的梦想负责。

森克就是梦的一部分，现在它要来了，我们总得想一想，怎么为它负责。（作者系悉尼小说作家，斯坦福工科硕士，前机器人工程师）

小说家诗一样的追求

□李少君

我一直把欧阳黔森当成诗人看待，虽然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非常高。

与他的交往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他那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始终隐藏着了一颗诗人的心。尽管他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领域的建树斐然，但那不经意间流淌出的诗意，宛如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却又坚定地向着世人宣告着他诗人的本质。

我曾读到关于他电视剧《花繁叶茂》的创作谈，他说当时创作的时候，大脑一直在回旋一首诗，像泉水叮咚般的旋律，他倾听到这个时代花开的声音，所以他的作品便有了诗一样的追求。

《欧阳黔森诗选》的问世，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其意义深远而重大。回首往昔，他创作的电视剧《奢香夫人》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影视界掀起了地域性历史人物创作的热潮。而这本诗集的出版，则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深处隐秘之门，引领我们走进他更为纯粹、细腻的创作世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他在文学道路上留下的每一个足迹。

以前有一个老先生问我一个问题，小说家称诗人为“诗人”，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称小说家是“小说人”？我后来想清楚了，小说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不一定呈现自己的形象，而诗人写的是自己所想所思。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小说家不写诗歌或者不写散文，就无法呈现自己的内心。有过一个故事，著名作家茅盾先生1930年代写过徐志摩的评论，说徐志摩太颓废了。有人反驳，说茅盾先生我看你的很多小说也很颓废，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结果茅盾先生很严肃地回答说，我写颓废不是我自己颓废，这是这个主人公颓废，怎么描写颓废一定是自己颓废，他不颓废你怎么写得出来。所以其实现诗歌的高度概括性、高度的凝练，小说客观上很难取代。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小说开篇常以诗为证，如《红楼梦》开篇的一首诗，恰似一把神秘的钥匙，开启了红楼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小说家能

写诗反过来说明这个作家是一个杰出的，应该说是比一般的小说家更有深度的一个小说家。

再说这本诗集里的诗。我感觉，欧阳黔森的诗像花一样，语言像花一样绽放。当时看了就笑了，为什么笑了？我突然觉得看到了欧阳黔森的内心，感觉有点像写初恋，很难忘记。特别是他的《梨花白的清香》这首诗其中的句子，“梨树，叶青花白/静静地绽放/梨花白的清香啊/正从你身上溢出/如手指顶在我的腰上/别动/我乖乖地举起双手/你的笑/一抹粉红/写上你的脸/钻进你的心房……”

欧阳黔森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严肃的人，但他的诗歌会不小心泄露他内心的一些秘密，这是别的东西做不到的。你看这首诗非常诗意的叙事，诗人淳朴天真，情感跟我们一样。诗歌与人的距离很近，他平时被大家不知道的一面就呈现出来了，小说躲在后面，诗歌一定是作者站出来，呈现自己感性的一面。一下子，我们俩的距离就拉近了，觉得他这个人形象变得很清晰，而且非常好打交道，亲切、朴实。当时这个诗，我一读就特别喜欢。

欧阳黔森早年的地质勘探经历，如同一场奇幻的冒险之旅，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他不仅探寻着大地的奥秘，更在不经意间种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那片辽阔的大地，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在大地上，每一寸土地、每一道山川都仿佛是一首等待谱写的诗篇，浪漫主义情怀在他心中如野草般疯生长。在艾青等前辈诗人的影响下，他同样拥有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时代的深刻感悟。在他笔下，西沙、钓鱼岛等地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承载着厚重情感与深刻意义的精神象征。《钓鱼岛》一诗中，他以奇思妙想将中国版图比作雄鸡，而钓鱼岛则宛如一颗小小的米粒。诗中写道，如果米粒的旁边有一条长长的虫子/你也不用害怕/雄鸡不是没有看见/只是还需嘹亮的警告。简短而有力的诗句，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出钓鱼岛与中国之间不可分割

的紧密关系。寥寥数语，却胜过洋洋洒洒几万字散文或报告文学，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最深刻的内涵。同样，《雷锋》一诗也精短而深刻，“活着的时候像一棵小草/去世的时候像一朵红花/大家把你戴在胸前/年复一年/你的颜色永远不会暗淡失色”，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高度概括，生动地展现了雷锋精神的永恒魅力，彰显出诗歌凝练之美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欧阳兄的长处，在人们看来似乎是在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上，其实不然，他的长诗《贵州精神》也非常感人。贵州这个地方，离湖南很近，特别是他的出生地是黔东铜仁，那里明代以前属于湖广行省，记得有个评论家评说欧阳黔森的作品时，说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充满着趣味、趣味嘛，就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源头之一，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亦如是。可以说我们对欧阳黔森的认识，是通过他的小说、散文包括影视剧，但用诗歌这种非常充满激情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心胸，对贵州这片土地的热爱更能打动我。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或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署名的诗人。屈原，犹如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了中国文学前行的道路。在《离骚》问世之前，虽已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叙事，但唯有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使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得以凸显。诗歌成为诗人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的舞台，每一首诗都铭刻着诗人的灵魂印记，屈原的作品便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映照。所以，《离骚》《天问》等等必须署上屈原的名字，因为这个只有屈原才能写得出来。欧阳黔森在影视剧创作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为贵州的文化传播与形象塑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诗歌于他而言，是一片更为私密、更为纯粹的精神领地。在这片领地上，他不再是讲述他人故事的使者，而是袒露自我灵魂的诗人。

可能若干年后，除了小说和电视剧，记住欧阳黔森的，还会有诗歌。（作者系《诗刊》主编，一级作家）